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彼岸与此境

■ 陈 引 驰 著

- ▲ ▽ ^ C

Chen Yingchi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彼岸与此境
陈引驰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5 插页 200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51-953-6
I · 191 定价：15.80 元

目 录

序 (1)

甲编 “西马”文论远眺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通说 (3)

历史·意识形态·形式 (27)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论题诸相

“总体性”与现实主义 (67)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与技术 (82)

红色30年代的“幻想与现实” (90)

形式主义·对话·复调 (108)

“否定的艺术” (124)

异化的救赎 (136)

结构及其演化 (150)

窥破意识形态 (166)

从文学到文化 (183)

乙编 文学当代散思

视点·层面·线索 (203)

视界与立场 (217)

诗语的歧变 (232)

旧诗的一种处境 (243)

“论学论治 困异时流” (251)

跋 (269)

- 彼岸与此境
-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甲编 “西马” 文论远眺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美学、文艺领域的成果是极为主要的一方面：是否可以归纳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统？如果可以，什么是这个传统在理论上的一致性？

●彼岸与此境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通说

泛义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括了主要流布于西欧、北美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潮。现今所用的这一名称，最早是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1955年《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使用的，他并且将这一传统追溯至卢卡契1923年问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考察原则，对一种思潮的把握，有必要从现实的和历史的以及理论的内在的两个层面着手。有学者细致地分析了近半个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尤其是其发生、发展

的历史处境，指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隐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外部传播的失败，以及它在俄国内部腐败的原因和后果，是这个时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都毫无例外地产生于政治上孤立和失望的环境之中。”^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宣告瓦解，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探索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脱离。30年代，纳粹势力兴起后，大部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处于流亡之中，或者向西到了英、美，或者向东到了苏联。二次大战后，这一批人几乎都在诸如大学、研究所之类的学术机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随着“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场所逐渐从工会和政党转移到了研究所和大学的院系”，^②“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越来越远”。^③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由于学术工作和政治实践的脱离，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理论化倾向。从整个趋势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注的问题。”^④

一、实绩鸟瞰与演变大势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移其经济、政治的理论指向相对应着，文化领域是它所热切关注的焦点，而尤其是文艺成为西

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展身手的天地。几乎每一个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文艺上都有值得称道的作品。“一个接一个的思想家在这个领域里以历史唯物主义前所未有的丰富想象力和严谨研究而名声显赫。”^⑤卢卡契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活中，几乎从未停止过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其建树使当代批评家称扬他“精通几乎全部现代欧洲和俄国文学”，且是研究巴尔扎克、托马斯·曼、19世纪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最大学者，^⑥而晚年的《美学》则是对现代条件下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雄心勃勃的总结。葛兰西身处囹圄之中撰写的《狱中札记》，以很大篇幅论述意大利文学，并且汲取发展了19世纪杰出的文学史家德·桑克提斯的观点。本杰明题材丰富的遗作中属最主要作品之列的就有关于文学、文化，尤其是对他所谓“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波德莱尔的研究；在他身前发表的有限篇章里，《论歌德的〈亲和力〉》曾被诗人霍夫曼斯塔尔评为“绝对无可比拟”，^⑦《论史诗剧》则是对布莱希特戏剧实验的有力支持，本杰明身前发表的两部书——《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德国悲剧的起源》——都是以文艺为主题的。我们知道，德拉·沃尔佩有一部《情趣的批判》、列斐伏尔有《美学文集》。^⑧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的最后著作都是一部美学书，前者名《审美维度》，后者名《美学理论》。从他们两人，似乎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美学领域。”^⑨尤其阿多尔诺在23卷全集中，除3卷《文学札记》，音乐研究将占12卷，从贝多芬中经瓦格纳、马勒直至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⑩其《美学理论》“现在往往被认为其成就甚至比《否定的辩证法》还要高”。^⑪萨特不仅在理论上，并且主要在戏剧实践中讨论了马

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乃至存在主义的问题，这些讨论的内在张力直接构成了他的作品所具吸引力的一部分。戈尔德曼在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研究诸领域交错推进，《隐匿的上帝》、《小说社会学》是不可忽视的作品。阿尔都塞当然主要是哲学家，而像偶而一作的《抽象画家克勒莫尼尼》、《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⑫也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精采分析。我们不必提那些出身学院、以学术为业者如马歇雷、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众多的美学、文学论著了。文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中占据着这样的比重，以至到 70 年代中期，学者回顾半个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发现“真正有质量的、广泛涉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一著作竟是一部美学研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和形式》”。这部副题为“20 世纪辩证的文学理论”的书对阿多尔诺、本杰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契、萨特 6 位理论家做了深入的剖析。这种情势不禁让人生出感想：“自从启蒙时代以来，美学便是哲学通住具体世界的最便捷的桥梁，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具有一种经久不衰的特殊吸引力。在这方面所写的全部著作，其内容之广博、种类之繁多，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遗产中所有其他著作相比，都要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也许最终可以证明，这些作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永恒的集体成果。”^⑬这大概语带夸张、言过其辞了。我们无法衡量比如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或《社会存在本体论》与《美学》或其他文学论作之间，哪一方面给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带来更深的刺激力，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样在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和《审美维度》之间，在本杰明的《论波德莱尔》和《历史哲学札记》之间，在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

法》和《美学理论》之间，等等，都是难以作出断然选择的。不过，夸张之辞有时能给予我们更深的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美学、文艺领域的成果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该没有什么疑问。

当我们列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美学、文艺学上的劳作；当我们试图在他们的文艺著作和其他理论著作之间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实际上暴露了一个困难的问题：是否可以归纳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传统？如果可以，什么是这个传统在理论上的统一性？

从实践上说，确实有一个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集团，他们所谈论的问题与20世纪流行的西方诸多批评流派如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截然有异。即使在西方学术界，这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放在一起，作为极有生命力的三种理论存在，认为它们终将取代解构主义。^⑭而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选本则既有按历史年代也有按论述主题编集的。在内容广泛的流派文选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也赫然列目。^⑮而我们一旦拿以上两个问题为准，作一探究，其结果却一定可以暴露出通常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的含混性。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其流变大势。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艺术做了较多的阐发，像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等都有不可忽视的成绩，尤其是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美学构想在整个美学史上都有其独特地位。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不仅对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眼中都是经典性的文献。而现今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文

学研究的潮流之形成在这之后，迟至本世纪 30 年代。卢卡契在 20 年代的革命风潮中，从政治的实践和理论活动中转向以文艺为主的学术研究。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开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初潮。欧洲大陆上这股有力的理论力量在 30 年代有关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论辩中显现其气势，当时卢卡契、布洛赫、本杰明、阿多尔诺、布莱希特都程度不同地卷入其间，这对于高扬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扩展其影响是非常有益的。这一时期最为丰硕的成果当数卢卡契流亡苏联时期的一系列文学研究成果了。差不多同时，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对文艺领域的影响呈现另一种面貌：红色 30 年代的气氛在英美甚至比欧洲大陆更为浓厚，出现了一大批与马克思主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化研究等作品，但往往缺乏的是欧陆的那种理论深度，今天回顾起来都显粗糙而不成熟。在英国，人们较为知晓的是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卢卡契，人们乐于继续俄国革命初期那种文学上的热情，而对《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意义几乎全无反响。当时最杰出的代表是克利斯朵夫·考德威尔。但较英国更为活跃，马克思主义的印迹和左翼倾向不仅在美共的理论家身上，而且在新生代的几乎全体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体现。几十年后，人们发现那些功成名就者，无论后来变得如何，当时都曾多少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二次大战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面貌是一次重大调整。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从流亡的革命家、知识界文化界初露头角的小人物，到学院圈中的受尊重的学者、教授。研讨方式、主题也发生了逐渐的变化。人们不只、甚至不是主要去讨论纯粹的

文学。或者谋求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术思潮对话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研讨的理论批评模式,像戈尔德曼的生成结构主义横跨社会学和结构主义,詹姆逊的文学诠释理论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视野下,最大容量地兼摄现代批评的种种操作方式和观念。在对文艺本身的研究中,由阿尔都塞创设的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赢得了广泛的注目,马歇雷全面讨论了本文构成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在文学本文中窥探意识形态内涵的“科学”的批评,这得到了伊格尔顿的响应。或者面对现代文艺的特点,较多地讨论诸如通俗音乐、电影、电视等新艺术,这一倾向早由阿多尔诺开始。他基于对现代主义先锋艺术对社会文化的颠覆性和对抗性,对于诸如大众音乐、电视等传播媒介做了贬意的论述,认为它们传播有缓和的、麻醉的效应。对阿多尔诺称为“文化工业”的这个艺术门类,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发展早先本杰明的思路,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相结合,作了远为复杂和技术化的阐发,得出了激进化的政治化的结论。像德拉·沃尔佩对电影(《拉奥孔 1960》),雷蒙德·威廉斯对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电视》),约翰·伯杰对绘画、摄影(《视觉方法》)的讨论都是可供启发的。这种变化的趋向逐渐显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正向着文化批评的方向迈进。像法兰克福学派基本是以文艺、美学作为解脱异化现实这一文化困境的途径,他们的美学论点与其社会批判融为一体。而英国自利维斯之后影响最为广泛的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将自己多年的文学、文化研究明确地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并名之为“文化唯物主义”,他相信“文化”能涵盖更多的东西。而美国的弗里德

里克·詹姆逊则在经历了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之后，向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第三世界文化等更为广大的学术领域发展。所有这一切——建构一种具有理论自足性、便于实践操作的批评方式，对新的文艺样式的探索，向更综合性的文化范畴的拓展——都体现着二次大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新的历史变化、新的文化情态之出现相适应的情状。

二、与经典传统之关联：主题 · 分析框架·方法论

从这一个大略的流变概要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一个变动着的混合型的传统，其构成方式、主题都处于变动中，互相之间且有着完全相左的见解，比如说30年代有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争论，后来针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等等。尤其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渐趋学院化而越来越明显地与其他学术思想的互融。像早先的考德威尔还是在有意无意之间采撷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带有英国传统的空想理想国色彩，那么后来，没有弗洛伊德的马尔库塞，没有皮亚杰的戈尔德曼，没有法国结构主义背景的阿尔都塞都是难以想象的了，而且这种融合大抵出于自觉。“这种同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时常公开同它对立的当代各种思想体系的不断汇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从未见过的。”^⑩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在渗透进其他诸种思潮的弄潮儿的头脑。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方法和观点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存在，永远影响、制约着人们的理解力，“不仅在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门科学中，而且在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都是每个有学识

的读者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一种学说”。¹⁷比如，像后来向右转的法国“太戈尔”集团包括了像朱莉亚·克利斯蒂娃这样的新锐批评家，就一度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立足点。罗兰·巴尔特早年曾经非常重视布莱希特，因为后者将马克思主义与意义的思考相结合；¹⁸他的《写作的零度》事实上是对文学形式的意识形态含义深微的揭示，当他谈论文学语言并非透明，而体现着一种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时；当他谈到作家构成自己的写作方式是一种对文学的社会性使用时；当他谈到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性显明起来，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写作方式因之而有根本差异（这让人想起卢卡契在《叙述与描写》中对他们两位的写作方式的分析与此完全类同）时，巴尔特和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存在太大的距离。后结构主义的批评家米歇尔·福柯在《权力/知识》中的一段话典型代表了一些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我征引马克思，不加申明，也不加引号。而人们不能读出那是马克思的文字，因而我被认为是不引用马克思的。然而一个物理学家写物理学著作，他是否有必要引用牛顿、爱因斯坦？他引用他们，但无须引号、脚注和颂扬的言辞来证明他对大师的思想何等忠实，因为其他的物理学家明白爱因斯坦的作为：他所发现和证明的。他们能从书中认出他。当今，要写历史，不运用直接或间接与马克思相关的一整套概念，不置身于由马克思规定和勾勒的思想视野中，那是不可能的。甚或值得怀疑，在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何本质差异。¹⁹

这并不是仅有的论调，克利斯蒂娃的保加利亚同胞兹韦坦·托多洛夫就曾语出惊人：你不是解构主义者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固然一方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另一方面也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接受了其他的学术思想作为融合的部分，既然许多西方思想家也有意汲取了马克思的思想成分，那么就要回答福柯的疑问，这之间有没有差别呢？这不是无的放矢。对托多洛夫的话还有更惊人的回答，美国甚至有人以为马克思主义就包括了德里达的作品；^②而还有人以为今日所谓“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新潮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重要反映。^③这多少是一种混乱，有必要澄清。我们还是应该回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来看一看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从而一窥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虽然没有专门的文学美学论作，但其中无疑隐含着系统思想的潜在结构。这种有生命力和有发展无限可能的潜在思想系统有待后来者的深入读解。在西方有一种说法，认为整部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持续不断的读解。我们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无论其思想倾向如何变动，关心的主题、焦点如何变换，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一种持续不断的读解和论辩。这种主题的连续性，尤其体现在初期的文学研讨中，比如30年代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现实主义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论题。在长期的思想旅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多角度地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作过阐发。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欧仁·苏《巴黎的秘密》作了评述，批判其中抽象的思辨原则，使小说人物成为观念的体现，小说作者基督教慈善主

义和改良主义作为一种乌托邦的指导，无法对社会生活作真实的展示，作品中的现实乃是“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意义的抽象”。^②恩格斯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批评中，同样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思辨性带来的对于具体现实的掩蔽。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的两封信成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经典，其中对真实性、倾向性、典型性等理论问题，对巴尔扎克和现实主义以及自然主义文学的析评都在卢卡契的著作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形成了体系性的基本轮廓。而在给哈克奈斯信中论巴尔扎克在作品里“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超越了主观上的狭隘同情，誉为现实主义伟大胜利的著名论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那里引来了一系列的阐说，如卢卡契、马歇雷都有相当精采的基于不同理论根据的分析。^④其余诸如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意识形态”论述的读解，马歇雷对列宁评托尔斯泰论作的读解，都是对经典性论题的或正确或误失的引申。这种主题的延展有时并不单纯是文学上的，也可以是哲学范畴内的，而深刻地规定了文论的格局。如随着《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刊行而广泛传布的“异化”概念，有力地影响了其后半个多世纪的哲学、社会分析。在文学中，“异化”也成了一个极内在的因素。比如在卢卡契和布洛赫、阿多尔诺等截然相逆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优劣观背后，“异化”概念作为他们共同的理论基点连接着他们双方。卢卡契相信只有“总体化”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能呈现这种异化现实，而布洛赫、阿多尔诺以为在分裂的异化现实面前，不是总体化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是片断化的现代主义才是对异化真实